

陈云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现实意义^{*}

——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为视角

宋学勤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卓越领导人, 陈云本着“适合老百姓的要求”的行动原则, 正确处理民生与国家建设之间的矛盾, 进行了大量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实践, 在一些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 “统筹兼顾”, 极力呼吁要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探究与学习陈云重视解决民生问题的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 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民生问题的发展态势, 把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对于切实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陈云; 社会建设; 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 (2010) 10-0020-07

有学者指出,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概念是最近几年才正式提出的, 但社会建设范畴内的许多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着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我们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 也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建设, 只是过去我们没有用社会建设这个概念去指称, 而把它分别归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名下。”^{[1](P5)}笔者赞同这个说法。毛泽东在 1941 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 最早把新中国的建设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谋划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时, 总是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为架构, 但在其中有不断进行的社会建设实践。因此, 无论是毛泽东, 还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 他们对“社会建设”都较少理论阐释, 而更多是在具体实践中的政策执行。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卓越领导人, 陈云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 也进行了大量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实践, 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建设

思想。江泽民在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9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陈云关于“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观点,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观点, 关于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的观点, 关于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定要一起抓的观点, 等等,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2](P1)}胡锦涛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00 周年大会上亦同样指出, 陈云同志一贯主张, 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 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 经济建设必须做到综合平衡, 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历史经验, 等等。这些重要思想,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 60 年基本历史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 08ADJ003) 及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资助课题(课题批准号: 10JJDJND282) 的阶段性成果。

对我们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3]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论,“陈云将给后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领导人留下一笔可以有多种解释的思想遗产”。^{[4](P195)}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本文拟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入手,探究陈云的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现实意义。

一、“统筹兼顾”:陈云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点

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人,陈云进行社会建设思考的思想原点是“统筹兼顾”。在“统筹兼顾”思想的指导下,陈云主张“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正确处理民生与国家建设之间的矛盾,把以改善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问题等相统一起来,并能辩证地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要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等社会问题,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并行不悖。

陈云认为,经济建设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是不稳固的,把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特别强调民生建设的政治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2年),百废待兴,在农村灾害频发,灾民日益增多之时,城市里正面临着严重的工人失业问题。陈云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在灾害救助与失业安置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采取一系列措施妥善安置、救济灾民,使工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陈云指出:新中国“不同于大清帝国,也不同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那个国,对人民当然更应该好一些。”^{[5](P95-96)}1956年,陈云针对市场上出现猪肉供应紧张,老百姓吃肉难的问题,指出:“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普通的商品脱销问题,而是影响党和人民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矛盾会越来越尖锐。”^{[6](P128)}1956年底,陈云在商业部党组会上说:“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7](P44)}1957年9月,陈云在中央八届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强调指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7](P85)}虽然工业建设比较重要,但“老百姓

要吃饭穿衣,是生活所必需的,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7](P85-86)}1959年6月,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其间还谈到了陈云的意见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8](P85-86)}1962年,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指出:“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利益。”^{[7](P210)}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针对农民吃粮依然紧张的情况,忧心忡忡地指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就会带队进城要饭。”^{[7](P236)}他提出要多进口一些粮食,不能认为“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要摆稳农民这一头,七亿多的农民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1985年,陈云看到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些农民对种粮不感兴趣,他提出“无农不稳”与“无粮则乱”,“十亿人口要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7](P350)}他始终把人民吃得如何看作是关系国运昌盛的大事。^{[8](P411)}

陈云善于从政治高度来看待民生问题。他认为,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他特别注意正确处理民生和建设的关系,试图找出一个民生和建设正确关系的标准,如他提出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7](P53)}建设的前提是要满足最低限度的民生。因此,他提出削减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认为“过去照顾基本建设多,照顾生产少,应该是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

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力再搞基本建设”。^{[9](142-143)}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陈云决策的出发点就是人民生活的改善。他说：“解放后八年来我忙什么呢？主要就是忙吃饭穿衣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是一方面抓建设，比如钢铁、汽车、飞机、石油、煤炭、铁路等方面的建设，另外一方面抓民生。建设与民生这两项东西看起来，民生很难与建设平衡。”^{[9](P201)}他又进一步论证说：“所谓建设和民生的平衡问题，实际上是工业建设和其他建设和农业建设的平衡问题，是工业、交通和农业的平衡问题。”^{[9](P202)}陈云认识到民生和国家建设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并相互制约。他说长江大桥是大，建设很有必要，但“关乎六万万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说是小事情，不重要”。^{[7](P34)}他强调制定国家计划“必须从有吃有穿出发”。^{[7](P85)}他反对只注意扩大生产而不注意改善职工生活需要的现象，他认为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7](P64)}他始终强调的是“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也就是说在制定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时，对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这两个基本方面，要兼顾和平衡，但还要有一个安排的先后次序，民生是第一位的。因此，他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合理安排的问题。”^{[7](P53)}相反，“如果我们只注意搞工业，不注意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搞了工业以后，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再回头来搞农业那就晚了。”^{[7](P86)}但自1958年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在国家发展建设中，忽视人民生活的“左”的错误占了上风，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在民生问题方面欠债很多，一些基础的社会设施如卫生、文教、住宅、城市公用事业等特别缺乏，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经济建设也大受影响。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0](P63)}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陈云反复强调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平衡发展的思想已为历史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陈云还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要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在这些关乎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上进行很多的探索与思考，成为引领社会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1957年8月20日，陈云就节制生育、解决吃穿问题的出路、处理增加工资与安排就业的关系等问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发言，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8](P395)}就业问题也只能继续推行“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方针。1979年6月，他再次指出：“人口是个爆炸性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限制人口的五项措施，特别强调要“实行社会保险，解决‘养儿防老’的问题。”^{[8](P246)}他认为，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由于认识到中国人口多的实际国情，陈云一直认为：“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8](P434)}1980年3月，他就长期计划的制订问题给国家副总理姚依林打电话，指出：“人口问题要有个规划。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问题不好办。长期规划中要考虑如何使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8](P257-258)}同年6月又致信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这个问题与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要。”^{[8](P259)}主张把人口问题与社会发展统筹安排。

另外，陈云还多次提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重要关系，提出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的重要思想认识。“大跃进”时期，为了追求煤炭生产的高速度，有关部门于1959年3月召开全国煤矿职工红旗竞赛大会，强调生产快速化，以保证每个矿井“面面高产，月月高产，大面积丰产”，以致全国各地的煤矿普遍遭受破坏性采掘，造成了惊人的浪费，破坏了许多地貌和景观，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在得知这些情况后，陈云忧心忡忡，并明确表态，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对于建设过程中无视经济客观规律，对资源采取掠夺性开发的错误现象，陈云给

予了严厉的批评。他大声疾呼，要坚决制止这种不良倾向。他指出：“要看到，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7](P254)}1975年7月，他在视察江苏高邮石油钻井时，指出：“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8](P198)}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指出：“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7](P254)}同年6月17日，陈云致信李先念、姚依林，提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水资源问题，二是工业污染问题。水资源的保护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陈云指出，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有节水办法。关于工业污染问题，他作出特别指示：“现已办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我们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患于先，这是重大问题。”^{[8](P248)}后来，陈云一再强调：“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他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8](P434)}1983年初，陈云对国务院领导说，要注意保护环境问题，这个钱总是要花的，晚花不如早花。同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防治污染作为建设的重点之一提了出来，他的经济建设要兼顾环境保护的主张引起了党的各级领导部门热烈讨论，使环境保护问题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推动了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1988年8月25日，陈云为纪念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和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创十五周年，亲自题词：“治理污染、保护环境、造福子孙后代。”^{[8](P414)}同年8月27日，他在给李鹏、姚依林的信中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8](P414)}他认为，“植树造林、治理江河、解决水力资源、治理污染、控制人口这类问题，都必

须有百年或几十年的计划。”^{[8](P270)}陈云留给后人的警示发人深省。环境污染带给人们的教训太深刻了，如果我们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惩罚亦会更加惨重。

陈云没有关于社会建设思想的专论，但他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统筹兼顾”思想成为他思考社会建设问题的基点。他用经济建设来推动社会发展，并把社会发展作为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认为二者应相辅相成。这是极其可贵的社会发展方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等于不顾及其他方面的发展。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就财经工作联名给中央写信，信中也谈到“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8](P240)}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地方领导搞“单打一”，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涸泽而渔，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造成环境、人口、社会保障、卫生保健、科技教育、文化教育、社会秩序等社会建设问题凸显，一些地方一度出现了社会矛盾尖锐化现象。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让社会更加和谐”，目的即在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不和谐问题。而解决之道，根本在于“统筹兼顾”，这是陈云反复强调的发展路径。

二、“适合老百姓的要求”：陈云社会建设思想的内涵及其具体实践的生动体现

作为党的第一代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心系民生，力主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社会发展思想，甚至把民生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认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在他7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身体力行，关心百姓生活，为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鞠躬尽瘁。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说：“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11](P296)}话语很朴实，但内涵深刻。他认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广大民众，为大家“当差”的，是遵循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见办事的。“适合老百姓的要求”，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朴素而深刻的诠释，又是中国

共产党执政为民宗旨的生动体现,也为检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提供了标准。

早在1939年,陈云在谈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时就认为:“群众有许多实际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群众会更信仰我们的党,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越来越高。”而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坚信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11](P172)}“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12](P128)}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要“适合老百姓的要求”。

做到“适合老百姓的要求”,看似简单,实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怎样做才能适合这样的要求?陈云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7](P33-34)}如他特别重视要搞好副食品生产供应。在三年困难时期,禽蛋鱼肉供应少,为尽力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陈云就提出争取给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7](P203)}为了增加鱼肉供应,他要求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要提高农民养猪积极性、减少猪肉油脂出口、解决好养猪饲料,以期逐步增加猪肉供应量,争取每人每月增加半斤肉。^{[7](P209)}陈云一贯坚持认为,尽管解决群众问题的办法,不应该而且不可能有固定的方案,必须看当时当地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是确定不移、到处适用的,那就是:“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11](P169)}他还多次强调为了避免犯错误,在开会、决定问题之前,要下去跑跑,搞一两个、两三个典型调查,仔细分析,使我们决定大政方针大体上不出毛病。“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7](P46)}这是陈云根据亲身实践得出的结论。如他当时解决老百姓吃猪肉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1961年,猪肉供应依然是一个问题。猪肉供应紧张,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质量,要想解决猪肉供应问

题的办法只有想方设法增加供给。为此,陈云在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期间,深入基层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搞调查研究,其间,他吃住在农民家里,听取来自各阶层人士包括农民的不同意见,就肉猪特别是母猪公养好还是私养好、农作物种植应如何安排、自留地是否需要扩大、农民的积极性、干部作风和群众监督等问题,召开了有干部和社员参加的十次座谈会,并多次到农民家中访问,了解农民养猪、种自留地、居住和吃饭等情况,还视察了集体养猪场、公共食堂、工厂、供销社和仓库等,写出了一系列调查文章。^{[8](P85-86)}针对当时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错误倾向,他明确指出猪私养要比公养好,一是好在饲料比较充足,二是好在私养猪每个月长肉比公养猪多两倍。他还了解到养猪的最大困难不是精饲料,而是青饲料。他还分析了养猪三个阶段对饲料的要求,一是刚生下来的奶猪需要吃流食,因此需要强化母猪饲养;二是满月后的克郎猪为撑架子需要吃青饲料,因此分散到农户饲养而不是由人民公社集体饲养可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矛盾;三是催肥的时候需要吃精饲料,因此必须给农民留足谷物加工副产品,并适度减少粮食收购计划。^{[7](P170-186)}看似养猪的小事,实则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大事。陈云通过调查研究所制定的系列方案,使生猪的饲养量大增,极大地缓解了百姓吃肉难的状况。如他所说:“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做不好这一工作。”^{[7](P46)}

在经济极为困难的延安时期陈云就指出:“我们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大的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的事情。”^{[11](P173)}但在他眼里,群众之事无小事。1979年的秋末,正值陈云动完手术在医院住院,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将要有大风、降温、雨雪来临的消息时,马上安排身边的秘书去做冬贮大白菜的工作。1980年12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专门讲到了蔬菜供应问题,指出蔬菜货缺价高的问题要靠各地党委和政府解决,要查原因,定办法。还特别强调吃菜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小了。^{[8](P265)}1982年10月25日,陈云致信胡耀邦、赵紫阳:“霜降已过,十一月八日立冬。今年应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还说“大白菜是北京市民的当家

菜,因此必须安排在前。”^{[8](P307)}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青的陆续返城,很多青年人的婚姻成了社会问题。针对这一现象,陈云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天津有,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尤其是女青年占比例很大,是个不算小的社会问题。建议书记处议一下,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8](P349)}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发出《关于关心三十岁以上未婚青年婚姻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重视和关心这个社会问题,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组织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抓好。1983年1月,他将《北京日报》刊载的反映市民“烧煤难”问题批转有关部门解决。这些百姓的生活琐事,作为一名国家领导人,始终系挂着,由此陈云也获得了一个雅号——“不管部部长”。^{[13](P39)}

陈云没有宏篇大论来阐述其社会建设思想,但在他长期的具体工作实践中形成的这些宝贵的思想认知,来源于他对中国国情、民情的熟悉和关注,反映了一名中国共产党人心系民生的拳拳之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大力加强、重视社会建设的新阶段,如何更好地“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开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局面,这是需要每一个共产党人认真思考和不断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我们需要努力学习”: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永恒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清楚地知道“赖以建立新中国的旧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实际状况:“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军阀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又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人民解放战争,使我国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在这样一个旧基础上进行新中国的建设“抱有无数的信心”,因为“中国人民为了解放自己,建设国家,在一百年中找遍了各条道路,考验了一切领导集团,中国人民是最后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而中国共产党也“将像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一样,胜利地建设我们的国家”,但“我们需要努力学习”。^{[12](P281-288)}确实,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因为领导国家建设对时仅28年成长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毛泽东把执政比作“进京

赶考”,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而当前,社会变革加剧,社会矛盾复杂多变,可以说,坚持执政为民,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社会建设能力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苏东剧变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之所以丧失执政地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效不能“适合老百姓的要求”,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缘故。早在1956年,陈云就指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建设中存在的“只要建设,不顾民生”的错误,提出削减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一再强调“第一位是生产,有余力再搞基建,基建中也要分轻重缓急。过去的分配原则与此正相反。根据上述原则,就可以避免犯东欧国家的错误。”^{[9](P143)}今天看来,此论堪为卓识。

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攻坚任务明确下来,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这样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新格局。总体布局的改变,并不是量的增加,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发展的新趋向,也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新要求,那就是“我们需要努力学习”,以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正如有学者指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问题,陈云同志都提出他的看法和意见,所有这些,有的在那时被采纳并付诸实施了,有的则没有被采纳,有的甚至受到误解和指评。然而历史却证明,他的观点和主张不仅在那时是正确和可行的,而且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和可行的。……当然,随着情况的变化,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但是,陈云同志

的这些基本观点,应该继续受到尊重。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凡是严格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因为它与客观规律的要求相符合,具有强大的持久的生命力。”^{[6](P1)}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与学习陈云重视民生、不遗余力地研究民生问题、科学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对切实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陈云的“统筹兼顾”与“适合老百姓的要求”、“我们需要努力学习”等理念告诉我们,以改善民生问题为主的社会建设是“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都极为密切。因此,在今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统筹兼顾”是出发点,始终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以及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的关系,切实使民生问题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与提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不用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应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要“统筹兼顾”,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更要重视社会建设,这也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一环。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等等。^{[14](P3)}这些问题的存在都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成效。陈云把“适合老百姓的要求”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行动原则,雄辩地证明了:解决民生问题不能靠空谈、靠拍脑袋、拍胸脯表决心来完成,而必须通过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来体察、来探索,然后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适合老百姓的要求”,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工作方法的指南。中国现在所临的民生问题,与陈云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国家持续发展前进中的民生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民生需求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则是要求时刻都要“适合老百姓的要求”,这就要尽快提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把陈云

解决民生问题的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落实在工作实践中,以适应社会转型后的各方面需求,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民生问题的发展态势,把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改善民生问题上有新的举措、新的突破,不断开创社会建设的新格局,使民生改善惠及全体国民,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得到全面推进,把社会建设和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更好更快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陆学艺.北京社会建设 60 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2] 《缅怀陈云》编辑组.缅怀陈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3] 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05,(12).
- [4] [美]大卫·M.贝奇曼.孙业礼等译.陈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5] 陈云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7] 陈云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朱佳木.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9] 陈云文集,第 3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0]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1] 陈云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 陈云文集,第 2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3] 朱佳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一生[A].侯树栋.一代伟人陈云[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49.
- [1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刘桂珍